

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刊年辨误*

杨传庆

晚近以来,北宋词人周邦彦的《清真集》为人瞩目,版本众多。晚清四大词人之一郑文焯(叔问、小坡、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是周邦彦词集的第一部校刊本。此本以律校词,校订精审,代表了当时清真词校勘的最高水平,也被后世研究清真者看重。然而,由于流传中著录疏于查核,学术界对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刊刻时间的认识尚有谬处。

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以毛晋汲古阁刻《片玉词》为底本,上、下二卷,《补遗》一卷,后附《清真词校后录要》(下文简称《校录》)一篇。《校录》篇末记云“光绪上章困敦之年大梁月既望”,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十六日。后世各家书目著录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者,多据这一时间认定其刊刻于光绪二十六年。如叶德辉《郎园读书志》,《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均记为光绪二十六年校刻,后如吴则虞、吴熊和、王兆鹏等学者都袭用此说。甚至郑文焯的女婿戴正诚撰《郑叔问先生年谱》也记其光绪二十六年“刊行所校《清真集》”^①。光绪二十六年是郑氏校阅清真词后撰成《校录》的时间,是否就是刻成《清真集》的时间呢?当然不是。《校录》的完成与校本《清真集》的刊刻并非同一时间。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刊刻于宣统三年(1911),是在朱祖谋(彊村、沅尹、古微)、夏敬观(映庵、剑臣)、诸宗元(贞壮)的帮助下刻成的。

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不可能刊刻于光绪二十六年,我们从郑文焯致友人朱祖谋与夏敬观的两封信札便可得知。其致彊村书云:

案:《满路花》有平侧二体,美成作共三首,无第七句不协之例,今考之《清真集》卷下《归去难》句调悉与《满路花》合,实同调而异名也。……丁未三月鹤道人记。^②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号:NKZXB1146)成果。

① 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同声月刊》第二卷第一号,第90页。按:戴氏所撰《年谱》记郑氏事迹颇详赡,然亦有误处,如记郑文焯与况周颐为同年,郑氏与赵熙订交时间皆有误。

② 黄墨谷:《大鹤先生手札汇钞·致朱古微书》,《词学》第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郑文焯认为《满路花》与《归去难》是同调异名之作,从信中“今考之”可知这是光绪丁未年(1907)作出的校勘成果。郑氏致映庵书云:

前承示清真《双头莲》校义至精,昨与沅公翻检柳词,得《曲玉管》一解,直是同谱异曲。起调两段,乃与清真冥合。审是则词之过片三字,确为属上无疑。虽平侧之调稍异,而句律则同一格,当据以引申补入《校录》,实佩审音,亟书以达。^①

此书中郑氏与映庵探讨清真词《双头莲》的校勘,郑氏言其与沅公(朱祖谋)翻检柳永词,通过柳、周的互证,认为柳词《曲玉管》与清真词《双头莲》句律同格,故断定过片三字属上。这封书信写于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十日,从“昨与沅公翻检”可知这一校勘成果就是近日之事。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吸纳了以上两则校勘成果,并且更加完善。从大鹤所言“当据以引申补入《校录》”,可知《校录》先于校本而成。如果校本《清真集》刻于《校录》后所记光绪二十六年,那么是不会出现1907年与1910年的校勘成果的,这是不言而喻之事。因此我们只能说郑文焯的《校录》撰成于光绪二十六年,而不是校本《清真集》与《校录》刻于光绪二十六年。

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不可能刊刻于光绪二十六年,那它到底刊刻于何时呢?我们在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那里看到了不同于常见的光绪二十六年校刻的记载。他在考述郑氏著书时,于“大鹤山人校本《清真词》上、下二卷”条下记云:

《大鹤山人校本〈清真词〉》,上、下二卷,光绪二十六年稿,卷末附语云:“光绪上章困敦之年大梁月既望”。宣统二年,朱彊村为大鹤所刊也,刊板已佚,流行甚稀。原稿本(傅沅叔增湘藏有)中记云:“校清真词前后几二十年,昨岁因老友彊村翁苦索旧稿以去,手录一通见示,将寄之武昌锲工陶氏写样雕版。既一年蒞役,复取初印红样本,斟酌至再,更得订误三四解,颇矜创获,具有佳证,同志嗟异久之。回思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岂欺我哉?版甫墨而武昌兵变,天下纷纷,南北瓦裂,神州陆沉,此版恐付之劫灰中已。展卷泫然,率记岁月,又识余哀。辛亥岁不尽五日。”^②

桥川时雄云校本《清真集》是“光绪二十六年稿”,不确,只能说《校录》是“光绪二十六年稿”。他又说校本《清真集》刊于宣统二年(1910),是朱祖谋为郑文焯所刊。从其引傅增湘所藏郑氏批校《清真词》原稿本所记,可以大略得知此次刊刻校本《清真集》的情况:1910年朱祖谋索郑氏批校稿本录副,寄往武昌,请擅长刊刻宋元旧槧的刻书名手陶子麟雕版,1911年印成红样本,郑氏再

①文中所引郑文焯致夏敬观书信俱见上海图书馆藏《夏剑丞友朋书札》,下文不一一注出。编年参考陈澧:《夏敬观年谱》,黄山书社,2007年。

②桥川时雄:《郑文焯·著书》,《文字同盟》第十二号《郑文焯》专号,1928年。

取初印红样本补校刊刻,然辛亥革命爆发,终未得广行完善之本。

郑文焯的记述显得简略,龙榆生又记云:“惟《清真集》已由新建夏氏刊行(板存吴兴刘氏嘉业堂)。”^①新建夏氏即郑氏好友夏敬观,照龙氏所云,是夏敬观为郑氏刊行了校本《清真集》。为了能对校刊《清真集》一事有较为清楚了解,我们可以从郑氏致彊村、映庵的信札中梳理出校本《清真集》刊刻的清晰脉络。

朱祖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退居苏州后,与郑文焯书札往还,过从甚密。郑氏在致彊村书中屡次言及校《清真集》事,其云:

曩斟《清真词》,每夜深呼镫,数起泚豪,累年不倦。自侈所得十之七八,惜近迫人事,录净本甫过半,亦以孤学寡兴,不过展卷相对,与古人歌哭出地耳。

承索樵风近作洎《清真》校本,许为墨版。自惟寡闻,过蒙赏较,陈义甚高,感且不朽。第拙编尚有零叠须删订,即《片玉》亦有续斟,未尽释然,假以两月,当以净本奉上,不久稽也。

至拙校《清真集》及近制,累日手订,益难愜心。盖已作之献丑,犹易芟夷,而前哲之疑尘,良难精析。拟更假时日,既竭吾力,稍稍会通,务求浹洽,庶免罣漏孟浪之讥。一俟写净,即当寄上。商量邃密,端赖宗工。^②由信札可知,先是朱祖谋约稿,许诺出版郑氏所校《清真集》。郑氏答应以誊清本奉上,但是其对所校始终不甚愜心,故久久不能交稿,直到1910年方才由彊村录副,寄武昌雕版。郑文焯在其1911年间致映庵书中对刊刻《清真集》的过程有着更完整的记述:

《清真集》得公以雄成,俾世士获睹完帙,下走附骥而致青云,诚天幸也……下走当拟一小序,记校勘始末,并特彰两贤宏赞之功不可没也。

清真词既得汲尹录副覆校,又承公先付高贻,属贞壮先生董而理之,以雄其成,诚三益之宏助也。可深感幸。昨见示写样,但从瘦硬加意,体欲其长方,凡省笔字,尤宜改细,不须强作满格,便合欧宋旧式矣。如复贞翁,切乞代致拳拳依迟之忱,尚有小诗寄赠也。

拙校《清真集》,承高义墨版,行世未广,宜及此补正。近年复校误,颇得未曾有,彊邨悉知之。有亟须勘定致刻者,暇当条具奉寄,或尊处当有印本,即乞日内检下,使具斟过,亦一适也。

从郑氏所言可知,此次刊刻《清真集》得到了三人的大力帮助:即朱祖谋的录副覆校,夏敬观的财力资助,诸宗元的董理之功。郑文焯在“宣统辛亥四月重校定”^③(1911年5月)清真词之后,对写样的格式提出了要求,同时希望将补校

①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5页。

②黄墨谷:《大鹤先生手札汇钞·致朱古微书》,《词学》第六辑,第68、69、70页。

③郑文焯批校《清真集》,括庵过录本,河北大学图书馆藏。

的内容勘定致刻者。为了刊刻完备,郑氏多次致书夏敬观,其急切心情于札中可见:“《清真》校本,想已专属贞壮先生,幸勿遗忘。何日偕往金陵,甚念甚念。”“再前属沅公代致《清真词》,留容校注数行,即乞速寄鄂省,付汇镳。幸甚幸甚。《清真词》补校,承代寄鄂,感甚感甚。”“《清真集》封页,昨日并已写竟。送沅公处,而渠已如沪,不审其几日勾留。幸为转达,余不缕缕。”从写样到红印样本,再到补校刊刻,校本《清真集》终于刻成,郑文焯致书映庵云:

并鄂刻《清真集》,昨始由沅公交下,校竟当即并书笺奉上。

《清真集》昨承沅老先印成数十部,极精雅之致,若以皖造古色纸浓印,宛然宋本。书内封题,七月中曾写付,而沅老适如沪上,不及见,今已属穆工补刊。里页题岁月及尊贯姓字、开雕颠末,稍暇必撰小叙记之。

郑文焯对先印成的数十部《清真集》非常满意,以“宛然宋本”评之。只是刻本并不完善,因为书内封题、岁月以及记校勘始末、友人宏赞之功的小叙并未纳入。这正是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不见这些内容的原因,也是误判刻本年月的原因,因为刻本中只有《校录》记录了年月。郑文焯一直想弥补这一缺憾,他在九月二十八日致映庵的信中说:

《清真集》盛荷蕲刊,雕版孤行,此义千古。但武昌兵火中,原槧恐不可搜致,良用悄然。从者抵沪后,倘与同志商榷,即以是本付之石印,俾无沦缺之憾,感甚何如?其间小舛,及增注一条,惟乞精心甄定,锡以序言。至企至企。

武昌兵变,大鹤担心《清真集》版片已付之劫灰,为了弥补缺憾,他希望用石印本再印并请夏敬观赐序。只是此时天下岌岌,战乱频仍,夏氏也离苏流寓上海,自己又绝无财力为之,故郑氏之梦想最终未能实现。因此,他才在辛亥岁将尽之时哀情满怀,展卷泫然。

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批校,郑文焯校勘清真词的成果在友人朱祖谋、夏敬观、诸宗元的帮助下于宣统三年(1911)得以刊刻,这就是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尽管校本已刊刻,但郑氏依然对清真词批校不辍,如其云:“昨见项城袁氏有宋板《清真集》、《片玉词》,始知陈少章刻《片玉》时在淳祐丙午,初以元人,误。丙辰冬中记于沪上。”^①大鹤一直坚持认为陈元龙为元人,故认为“片玉词”为元人命名,这也是他以毛晋汲古阁本《片玉词》为底本刊刻,却易其名为《清真集》的原因。直到丙辰年(1916),他见到了袁寒云藏本方才改正自己坚持了二十年的谬误,而此时距郑文焯去世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由此也可见一代学人研究清真词之勤勉。

对于清真词的校勘,郑氏曾云:“余校美成词凡卅余过,正其讹脱,所得实多。”^②龙榆生也说:“大鹤之于清真,弘扬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三,一时有

^{①②}郑文焯批校《清真集》,括庵过录本,河北大学图书馆藏。

‘清真教’之雅谑焉。”^①不难看出,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也有批评的声音,如郑氏好友吴昌绶(印臣)就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

夏剑臣代小坡刻《清真词》,弟不以为然。此事惟公考之最详,最确。兹寄上,求公随笔纠其谬误。至所引各书,无一古刻,专以毛本、王本、《词萃》、《词律》为言,可谓托体不尊矣。^②

吴氏对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的不足加以批评,并且称赞了王国维的清真词研究。王国维也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说:

去年文小坡刻《清真集》,印臣曾寄以见示,不独所见本太少,乃至书题亦复不通,后跋亦不知所云,远不如毛刻尚存强本之真、王刻亦仍元刊之旧,此刊殊为赘设,谅长者亦见之矣。^③

王国维从存真保旧的角度出发,对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从郑氏校勘清真词的实践来看,王氏的批评反映的恰恰是郑文焯勇于裁决的校词特点。也正是郑文焯与王国维这些清真词研究专家从不同侧面的努力,后世清真词研究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①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三号。

②马奔腾辑:《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

③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456页。